

戎马生涯

施廷璧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戎马生涯

施廷璧

前 言

参加革命五十余年，最令人难忘的是开头十年的戎马生涯：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经历了整个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从解放初的剿匪到守卫海疆，解放一江山岛，迎来了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壮大。

我是个普通一兵。从一个农家儿，投身于伟大革命斗争，在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参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役，走过一道又一道的险关，使我不断变得成熟、坚强起来。特别是那些在艰苦岁月中生死与共的战友，那些在烈火磨炼中手把手教我不断成长的领导，在我脱下戎装的日子里，时时萦绕脑际，而不能忘怀。1987年离休以后，人到老年，更常常情不自禁地追忆往事，缅怀先烈，回想那些激动人心的战斗、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深挚的战斗情谊。直至近年，产生了强烈的要把这些经历写出来的愿望，想以个人的点滴回忆来纪念这一伟大战争和为取得革命战争胜利，曾和我并肩战斗过，并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友们。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来之不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驱逐黑暗，迎来光明。相信共和国的未来，在党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一定能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我在撰写这本小册子中，得到了县政协邱凯旋、林志龙、王德威三位同志的热情支持，王先生并亲自帮助整理、修改、编纂，县机关印刷厂谢绍其为之设计封面，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这本小册子作为我大半生经历的缩影，奉献给我的老战友、老同志，只是留个纪念，并希望给予批评、指正。

古老美丽的妙西故乡

1926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妙西乡妙西村。

妙西，在湖州城南十三公里处，地处太湖南岸，这里有一望无际的水稻田、蚕桑地，是浙江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在这环境优美的水乡，有一条鹅卵石和石板铺就的陆路直通湖州城，中间要跨过好多座石拱桥：王家桥、杼桥、三里桥、和司桥、渡船桥……；水道，从王家桥坐船直达湖州城，河道弯弯曲曲，深浅不一，宽窄不等，到湖州城流入城中运粮河。运粮河向北在小梅口流进了太湖。

早年，妙西村庄附近较平坦的小山坡上有一片片大松林，大约有二十多片，一般松树有一二抱粗，几丈高。童年时，我们三五成群到松林去耙松毛作引火柴。在三里凉亭那里有一大片老松林，面积大，松树也大。每年立春至秋分季节，有成千只红顶黑脖子的白鹤在这里筑巢产卵，孵育幼鹤，繁殖后代。尽管这片松林很大，我们却不去那里耙松毛。因为白鹤以稻田中的青蛙、泥鳅、田螺、小鱼为食，它们的粪便拉得松林一片雪白，鱼腥冲天。我们最喜欢到太沧蚕童阿三家的山上的松林去耙松毛。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松林都逐渐被破坏了。

在抗战时期被破坏的还有妙西的大榆树。以前大约有三十棵。我家有五棵，邻居童家也有五棵。在日军占领时期二十九棵被破坏了，低价出卖到上海造船。后来只留下唯一的一棵长命树，群众又称它为救命树，因为这棵大榆树下有个大坟洞，里面能容纳30个人，日寇炮轰妙西街时，村里人就往这里躲，救活了不少人。

妙西还有一个妙善寺，山门前面有一棵三四抱大的枯树干。山门前面是河港，对岸坐南朝北有一座两层大戏台，演员在底层化妆，到上层演出。寺前河港上泊满了大小船只，人们坐在船里看戏。记得我童年时，每年阳春三月都要演五六天戏，到那里看戏是孩子

们最快活的时候，我们最爱看的戏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看到孙悟空用金箍棒打倒一切妖魔鬼怪，孩子们兴高采烈，感到真是痛快极了。

妙西还是个文化古城。

一千多年前唐代，世称“茶圣”的陆羽，曾长期居住在妙西的杼山妙喜寺，写出了举世闻名的《茶经》。陆羽在妙西杼山与妙喜寺僧皓然等结为至交，当时湖州太守颜真卿十分器重陆羽，在杼山为他建造“三癸亭”。颜真卿的《三癸亭》诗中有“款构三癸亭，实惟陆生故”句，可以证明颜真卿为陆羽建亭，而诗僧皓然《奉应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三癸亭》诗中有“缮亭历三癸，疏址邻什寺”句，证明“三癸亭”在妙喜寺旁，也说明颜真卿、陆羽、皓然等的往来友谊。颜真卿还曾邀请包括陆羽在内的十九位浙西文人名士共同修编《韵海镜源》。可见当时妙西文人雅士活动的风流盛况。

陆羽逝世后和僧皓然俱葬在妙喜寺旁。据《浙江通志》载：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妙喜寺改称为宝积禅寺，杼山也改名为宝积山。妙喜寺前有条河称黄泥涧，直通湖州，与霅溪汇合。寺山门前有桥名杼桥，1972年填河为街，其中有一泉水潭，遗址现在还依稀可辨，潭旁传说是寺僧墓葬地。妙西村民周有贵建新屋时曾在附近掘出许多埋葬僧徒的缸瓮，因此可以肯定陆羽和皓然的墓地也是在这里。

因为妙西有杼山、妙喜寺、三癸亭等有关陆羽的遗址，1984年4月22日，日本静冈岛市访华团温汤绍幸先生寻访杼山，1988年6月12日，日本茶道小川派兴代传人小川后乐先生也到过妙西。同年9月11日，日本茶道内千家山派执事多田先生攀登杼山，高兴地说：“杼山寻着了！”回国后，他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轰动了日本茶道界。

1993年初，杼山脚下妙西乡百姓自发捐资重修“三癸亭”和一些有关陆羽的遗迹。4月间台北市艺术学院人事部主任沈镜原先生回家乡妙西探亲，回台后把家乡发展情况以及修复陆羽“三癸

亭”等情况告知关心故乡的陈立夫先生。时已九十四岁高龄的陈先生听了后十分兴奋，当即提笔写了“三癸亭”三个大字寄回故乡。

家乡秀丽的山水，文明的社会风貌，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也有一个地方在我童年的心灵上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残酷的烙印，这就是“老营子”。

所谓“老营子”就是楼上楼下加上大小平屋近二十余间的一片房屋，就在我家隔壁，这原是杼桥旁边沈氏家族的，据说他们住在那里不吉利，后来另选新址建造新屋居住，这一大片房屋就常年空着。有时村人在那里演戏，平时常有旧军队驻在那里，所以人们就称它为“老营子”。

记得我八九岁时，因读不起书在家里带弟弟，大概是在1935—1936年间，国民党军队经常要清乡，许多重要乡镇都有驻军。这时，“老营子”就驻有四十多人。天天早上到白道地（今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出操，晚上集合唱歌，长官训话。长官训话时把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儿童都赶走，关上门，不准我们看，也不准听。他们又在交通要口、桥头设路障，整条妙西街都用尖尖的竹片围起来，把人家都围在竹篱笆内，冬天四五点钟就封锁，派人敲更巡逻，弄得整个村子、街道阴森森的，我们男小孩顽皮一点的傍晚还走出家门去溜溜，女孩子就都不敢出门。

有一年冬天，天气很冷，冰棱结得有几尺长。不知什么人把一个人的头颅用刺刀刺了一个洞，用柳条绳穿起来挂在青石桥桥门边竹竿上示众，后来不知什么人又把一个香烟蒂头插在死人头的嘴里，弄得过路人惊心动魄。这个桥门离我家不过十几公尺，使我们全家都觉得阴森可怕，这人头挂了四五天，不知什么人拿掉，也不知落在何方。

第二年夏天，驻在“老营子”的官兵从乡村捉来男女6人，关在营中。上午我到营门口，看见一个黑黑胖胖的三十岁光景的农村妇女被五花大绑绑在廊柱上，一个兵用皮鞭抽她的大腿和屁股，另一个用胶鞋底左右开弓打她的脸。她被打得两脸发紫、嘴鼻鲜血直

流。士兵边打边喝道：“招不招，土匪在哪里？”残酷的行刑场面，真令我惊魂动魄。另外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人，手足被反捆在一起，飞鹅吊吊在空中，脸向地，背朝天，腰背上还压上一块石板，一个士兵站在石板上蹬跳，嘴里不断地叫着：招不招！招不招！我看得浑身发毛，这个人即使不被折磨死，也得终身残废。另外几个人关在里面，不让我们看见，后来听说他们受的刑更加残酷，灌辣椒水，老虎凳……都用上了。这些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这些官兵也不准我们打听，我只感到，这些官兵真是一些没有人性，惨无人道的人。

还有，在1931年“9·18”事变东北沦陷之后，有一年冬天，有一男一女借住我家楼上，他们既不像军人，又不像夫妻。两天后，我父亲向驻军军官说明，后来驻军军官来我家查问这两个人，他们说是某军政治部来宣传抗日的，过不了多久，二人离开我家不知去向。

“老营升”，在我对故乡的美好的回忆中留下了一块黑色的阴影。

天真的乡村童年生活

我祖父名叫施大年，年轻时参加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太平军里当过队长（相当于现在的连长），太平军最后失败，军队都散了，一般士兵先回家，当军官的迟七至十天（可能是被清政府抓起来集训之故），那时候信息不通，我祖母看见别的当过太平军的人都回家，唯独我祖父没回来，她自以为祖父被杀害或战死，心里悲痛，竟投师姑潭自尽。祖父回来后又娶了一个江苏女人，我小时，她待我很好，叫我阿大，常帮她拿拐杖，她缠过足，三寸金莲，我常扶着她一起走路。

我祖父从太平军里带回了三件宝：一是大刀，二是梭标，三是

斗笠帽。这三件宝挂在楼梯间板壁上，一般人不准动它们，就我小时候可以去玩大刀，戴斗笠帽，但也只准在家里玩，不准拿出外面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大刀薄薄的钢质，有两斤重，很锋利，我曾到后园去砍桑树枝，大刀一挥，手起刀落桑枝就被砍成两截。大刀的刀鞘只有半斤重。不知用什么木板做的，很薄很薄，中间一段包了一层很薄的牛皮。斗笠帽是竹丝编的，编得很精致，涂上青油等油类，发亮，又不漏水。帽顶缀一颗石珠，有弹子那么大，中间穿个孔，穿进一束红丝线，散开在帽顶上，很威风的。梭标很沉，我人小使不动，不爱玩，我玩过后，必须按原样挂在壁上，可惜这三件宝都因日寇在妙西放火连我家屋子一起被烧毁了。

我从小好动，胆子也大，白天夜里常到田野里去活动，捕蛇，捉鸟兽，从不知道害怕。

小时喜欢骑牛，十岁那年在现今妙西中学所在地的山坡上骑别人家的牛，这是一头没调教好的小牛犊，我一骑上去它就乱蹦乱跳，把我甩在了地上。地上正巧有许多砍掉了的桑树根株，根株头笔尖，一下子戳进了我的下腭，鲜血直流，幸好另外一个放牛的过来，把我扶起，从自己的棉衣里撕出一块棉絮，按在创口上把血止住，但至今留下了一个伤疤，从此我就再也不敢骑牛。

过去在农村里农民常用下弦（也称下吊）捕野猫、兔子、白面儿等野兽，其办法是一张竹弓，用绳拉紧，安在田埂、山坡野兽必经之处，野兽脚一踏上弦里的机括，竹弓张开，绳子套住兽脚紧紧拉进竹桶里，不能动弹。那年冬至，傍晚我把弦下在杨家山路上，第二天一早摸黑去看，弦不见了，起初以为被人偷走，后来仔细观察，原来套住了一只大野兽，弦被它拖走了。我沿着痕迹寻去，到离开十几公尺的稻田里，竹弓被稻秆株钩住，一只足足有七八斤重的白面儿被套住了。它一见我走近，大叫了一声，吓了我一跳，看我走过去，叫得更响，并且张牙舞爪露出凶狠咬人的样子。一时使我感到惊慌，我怕它会跑掉，急中生智，立即拔出腰间柴刀，对准白面儿的脑壳鼻梁狠狠敲了几下，它这才不叫不动。我收拾了场地，就连着竹

弓把它背回了家。父亲见我背回这么大的一只白面儿也十分高兴。他解开了绳子，整理好竹弦，把它浸泡在屋旁的师姑潭里。然后动手剥去了皮，净肉足有六斤，五香红烧一大锅，一家五口人吃了二三顿，吃得很开心。剥下的皮后来卖给商贩，卖了三元银钱。父亲答应给我买一双雨鞋。可惜后来不知怎么买来了一双浅口的女式鞋，不能穿，实在令我扫兴。过了半个月左右，大概是小寒季节，夜里去杨家山，在田埂上碰到了一只白面儿，它一见我转身就向山上逃去，我立即拔腿紧紧跟在后面追，追了十几公尺，它跳进了水稻田里，稻田里结着冰，我不顾寒冷也脱鞋跳进冰水里，它钻进了稻田旁边一个泥洞里“呱呱”地乱叫，我拿起冰块石块向洞里用力猛掷，大约三分钟后，白面儿不作声了，我用手探进洞里，一把抓住它拖了出来，已经死了，我把它洗净了丢在田埂上，然后上岸洗脚，脚上黏上许多碎冰，一时兴奋得不知道两脚已冻得发僵。但可惜这只白面儿太小，只四斤来重。回到家里已近黄昏，第二天剥下白面儿皮只卖二元银元，肉也没前一只大的好吃。这时我大概是十三岁。第二年的一个寒冬腊月，天刚亮，我出门碰到一个卖柴的人好心告诉我：河港里有条大鱼向上游去。向河里一望，果然看到大鱼在河里游动的水浪花。当时手中什么工具也没有，急中生智，跑步到王家桥一家熟人家里去借鱼叉。一时心急，也顾不得与那家人细说，自己踏上高凳拿下挂着的鱼叉直奔青石桥，看到鱼在河港里游，在岸上，鱼叉太短够不上，就脱鞋跳进河港，瞄准鱼身猛力刺去，刺中了大鱼。虽然人小力气不足，我使尽全力连叉带鱼顶在河底不放松，最后鱼儿不能动弹，我双手抓住大鱼连叉捧出水面，一上了岸，这才觉得双脚冻僵麻木，迈不开步，不能走动。幸亏有个担柴的把我扶到家中，到家一秤，这条草鱼足有四斤重。我冻僵的双脚到家后仍不能行动，拿温水来浸泡，脚一浸入温水就感到刺心似的痛，足足泡了一小时，痛得眼泪直流，才慢慢恢复了。

我这个人从小就是这样：胆大力大，天不怕地不怕。一次冬夜里去山边下弦捕野兽，在青果山和杨家山路边，有人家停放着一具

棺材，棺材旁还立着一个草人，人走过时枯叶尘土沙沙作响，我不但不怕，还以为棺材旁有野兽，走近去仔细查察。所以人家都说我人小胆量大。小时候跟伙伴摔跤，比我大三四岁的也摔不过我。

我的家是个勤劳节俭的家庭。

每年春汛期间，太湖里肚里怀着松花子的大鲫鱼就溯水上游到我们家附近河浜港汊里产卵，这时我们就去捕鱼，有时每天能捕到六七斤，鱼多吃不了就加工。我们还在附近的师姑潭里养鱼，有客人来时就从潭里抓一条鲜蹦活跳的鱼烧来待客。

我家有不少田地山等产业，但除少数田是祖上留下的外，大部分是自己垦荒的。如髻头山土质很好，我们去垦荒种番薯、养毛竹，后来发展到三十多亩毛竹笋山。家里养猪，猪粪便作肥料壅田地，也壅山上毛竹，把我们这一片竹林养得碧绿青翠，非常美丽。

暗无天日的抗战年代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陷入了八年抗战的苦难之中。

离我家大门前不到一公尺有一条三公尺宽的大道，由西南通向东北。大约在十至十一月间，有成千上万国军昼夜不停地去抗日前线。他们身穿灰色棉军服，背着背包，头戴法国式和德国式钢盔，肩扛步枪、轻机枪，有的四五个人抗着德国“马克辛”重机枪，还有许多骡马载着迫击炮，拉着有轮子的大炮，叮叮当当，浩浩荡荡，开赴上海前线。在炮兵的后面，四个士兵抬着一把躺椅，上面坐着一个又大又胖的军官，他扭头看看我家，看看站在家门口身材瘦弱，衣着破烂的我。我也呆呆地抬头望望他，看着这大队人马行进。国军不断行进，足足有四昼夜。

一天傍晚，有六个伙夫挑着三口大行军锅闯进我家，在我家楼下中堂里一字形排开行军锅，开始挑水淘米烧饭，到了深夜，他们

竟在家里翻柜倒篋搜寻白米，我三堂祖母起来求情，他们不但不理会，还拿起扁担要揍她，米屯里的米全被抢走了。姚荣生家有近万斤稻谷放在我家准备运往姚村，后来也不知去向，人们还没有遭到日寇的难却先遭到国军的劫。那时风声鹤唳，整个妙西十室九空，青年男女，逃进山村。夜深人静时，我家门口四棵大树上几只猫头鹰声声啼叫，令人心惊胆寒。

一个寒冷的冬天，我父子二人正用黄泥拌稻草在粉涂竹篱笆。几个官员模样的人路过说：“老人家，你们还涂这个干什么，日军很快就会过来。”他们指着我家门前大树又说：“这么大的树也被毁了，土篱笆墙有什么用？”果然，几天后，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很快占领了上海。这回国军由东北向西南撤退。又是一连四昼夜一路不停地撤，不知是撤向安徽铜陵，还是去芜湖、南京……，国军逃跑得很快，后勤部队几个伙夫送饭都来不及，大量烧熟的饭又带不动，统统都倒在沈才宝家的桑树地里，像一坐白色的坟包，有个缺德鬼竟在饭堆顶上拉了一堆屎，周围老百姓见了又恶心，又心痛。那时百姓家里的米被国军搜干净，人们没饭吃，大家只得用铁锨铲去饭堆上的屎，用淘米具把米饭在河里淘净，然后再晾干当粮食。

在国军纷纷西撤的时候，日寇迅速进军，很快占领了嘉兴，向西南推进，不到七天就进占了盛泽、南浔、昇山八里店，接着侵占了湖州城。日军一进城就大举烧杀抢掠。听说日军一见到青年就残杀，有个青年店员被砍下头，头颅丢进了酱油缸里……

日军逼进，人心惶惶。而当地的官绅、盗匪、小偷却乘机兴风作浪，残害百姓，三天两头都有某家被抢、某人被杀被伤害的消息：住在三里凉亭的吴阿大被刺五刀，抢去了他仅有的二百斤大米。住在姚荣生家后面三间草棚里的一家温州人的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被钮家村钮小毛抢去为妻。南平洋（妙南村）伪保长强占童士田妻为妾，我陪童向国民党政府到处告状，毫无结果……这一年大旱，稻田颗粒无收；立秋后种荞麦，荞麦刚开花灌浆，又被洪水暴发冲倒了荞麦，减少了收成。人们只得糠菜半年粮，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即使

这样，国民党政府还要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外祸将至，内乱先临，这世界真是民不聊生，暗无天日，我父子两人那时只靠到十五里外杨和寺那里扛毛竹为生。每天翻山越岭，肩头皮破肉绽，只图得半饱。

日寇铁蹄终于来践踏妙西了。

1937年11月中旬，日寇30余人第一次进入妙西。大部老百姓都跳进太仓岙里，搭起简易草棚避难。年仅12岁的我挑着二十斤大米在逃往太仓的途中，日寇已进入妙西，见逃难人群犹如潮涌，就向山上开枪击中桃园外老松树，树枝打断，纷纷坠地。日寇在妙西街上抢了一些香烟、捉了一些鸡鸭，下午三时就回天目山去了。

1937年11月下旬，一大批日寇第二次轻装进袭妙西。我家来不及逃走，父亲被抓住要他带路，翻译问他，他摇着头，一问三不知。十三个日本兵住进我家烤火取暖，其中一个大胡子挂指挥刀的军官坐在中间。大门左边一挺轻机枪，右边靠墙五支日式步枪。我胆子大，想去掂掂机枪的轻重，一个日军“哈”一声，不准我动。我母亲带着两个弟弟躲在隔壁空屋里。屋里存放着一口棺材，母亲作好准备，一有动静，她立即躺进棺材里，免遭日寇蹂躏。日寇在街上店里抢去了许多香烟，又不知哪里抢来八尾大草鱼，抓住一个叫“白癩痢”的人担着。他们走到沈士心家门口（今乡政府），有二十余个爱国官兵躲在曹家弄西侧童士田家草棚的黄土墙后，对准日寇机步枪一齐开火，日寇毫无准备，当场被打死六人，打伤四人。我爱国士兵打了一阵就撤离。这时“白癩痢”想趁机发洋财，拿起鱼就跑，不想当时被一个日军撞着，举起刺刀，哈！一刺刀刺进白癩痢胸膛，当即送了他的命。日寇经此一打击，就抬着尸体和伤兵向南平洋逃去。

那时人们已经知道日寇的“三光政策”，所以这一来妙西村人心惶惶，不知日寇什么时候来报复，有钱的人家纷纷搬家，躲进稍坑、大冲等山村，整个妙西，一到夜间寂无人声，连鸡声也听不到，充满大祸临头的气氛。

大祸终于降临了。

十一月底的一天早晨五时许，南平洋方面战马嘶鸣，军犬狂吠。从王家桥方面奔来了许多逃难人。一见我父亲就叫“大爸，大批日寇到南平洋了！”我们随即关上大门走后门。刚打开后门，前面青果山、杨家山上抗日官兵先发制人，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子弹把我家后门桑树枝纷纷打断，子弹打得后墙泥土飞起，散落在我头上和肩上。我们赶快从后门缩回来，关上后门，从南边小门走出到弄堂，向西南逃奔。碰到两个人告诉我们王家桥一带都被日军占领，我们只得向东北曹家弄逃出，逃过石马头，渡过肚坑沙河，横跨泥沙路，钻进了一块毛竹山。鬼子的机枪、步枪对准我父子二人射击，子弹打在我身边岩石上，打得岩石碎片乱飞。我一头钻进岩头背后，伏着不动。一听鬼子枪不响了，赶快往癞头山猫着腰向前时，爬到半山上，大概鬼子从望远镜里看到我们两人一老一小不是军人，不开枪了。我们爬上山峰，翻越肚坑岭，父亲说先到鸡山王家八村庄远房亲戚处暂时避难。到了那里，望见隔山妙西方面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我母亲在竹林处和我们分开，后来去施家湾罗家村母舅家避难。

七天后回到妙西，只见除陆羽住过的妙喜寺和日军驻地一幢楼房外，整个妙西留下一片焦土，连猪圈厕所也一个不留，在一片废墟中留下了十六具尸体。

我们全家在罗家村舅父家避难。妙西被烧后没几天，父亲把母亲和两个弟弟留在罗家村。我们父子二人挑着一些大米、行李和碗筷炊具最先回到了劫后的妙西，父子二人四处找寻一些烧残的木板、砖瓦，东一支、西一块，收集起来挑到自己家被烧光的房屋焦土上，准备重建家园，第三天下鹅毛大雪，父子二人躲在断垣残壁下，一天吃两餐粥，坐等天晴。雪还在下，第二天有一百四五十个鬼子兵从三里凉亭由西南向东北行进。我父子老少二人躺在草窝里不敢作声。鬼子兵队伍离我们只八九公尺的路上经过，不知去向何方。十天后，天气好转，妙西人陆续回到烧成焦土的家园，家家户户

各自用毛竹稻草搭建草棚栖身，草棚与草棚互相倚靠着连成了一条黄龙卧在原妙西街旁。唯有我家因为来得早，拾得砖瓦自己搭了一间半瓦房。

当时宁杭国道被日军占领，公路交通断绝，妙西山区的山货只能从妙西港口从水路运往湖、苏、沪等地销售。第二年——1938年春天春笋旺发，在深山避难的人逐渐都回到妙西开店、经商、做工……，妙西又恢复了繁荣景象。

但好景不长。那年春夏之交，鬼子兵从天目山向妙西街炮击，老百姓有的躲进山里，有的躲进沟里，我那年十四岁。一天日军又炮轰妙西，我和奶妈的儿子二十四岁的沈才福（他采桑回来）一起躲在青石桥下。桥是南北向的，我坐在桥板外，他躲在桥洞里，鬼子大炮弹落在桥南埠头爆炸，一块弹片飞向北头石桥墩上，倒弹回来，不偏不倚正好击中沈才福的脑门顶上，噗的一声，他倒在我的胸前，血流不止，没哼一声就死去了，嘴里还有一支大联珠香烟没吸完，掉在桥下石墩上继续在冒烟。鬼子的大炮还在射击，我也顾不得危险，赶紧跑去告诉奶妈。一见奶妈就叫道：“妈，哥哥被炮弹炸死了！”奶妈开头还骂我：“乱话三千”。我说：“真的，我身上还有他的血，不信你自己去看，他还躺在桥下呢！”她带着小媳妇美英奔去，不一会，两人号淘大哭起来，哭声和炮声混合在一起，医生诊断已无法挽救，尸首抬回家，全家悲痛万分。至今六十年。我回妙西路过青石桥总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

同年夏天里的一天，杨埠沿村杨家一个二十岁的独子，早晨七时扛了一驼毛竹到妙西，靠在老营升路边的高墙上，不到三分钟，天目山鬼子突然开炮，炮弹落在他头顶的高墙上爆炸，立即墙倒人亡。第二天他妹妹在我家门口哭得昏死过几次。过路的人们也陪她流了许多伤心泪。

第三年——1939年夏天，日寇又侵犯妙西，住在白道地（今乡政府所在地，离我家约八十公尺）北边的童志尚父亲童阿三，约三十余岁，穿一件长衫，逃难时跑不快，当他向杨家山自己的笋山跑

去时，鬼子兵追近了，他钻进了一个不到一公尺深的黄泥洞里，鬼子追上，一刺刀，把童阿三的肠子都挑了出来，后来送医院无法抢救死亡，只有三十六岁。全家就靠他一人生活，他一死，真是家破人亡，无限悲惨。

这年夏天，山货流量很大，妙西港内泊满大小货船，街道人来人往，呈现了一派兴旺繁荣的气象。但是，日机四架突然飞临妙西上空，先分两架一组，低空盘旋，飞得很低很低，几乎掠着山上毛竹，机翼上的太阳徽和驾驶员都看得清楚，人们急忙四散躲避。一会儿，在妙西街最热闹的地段王志清茶馆门口投下了两颗炸弹，当场炸死两人，炸伤三人。炸弹引起了大火，熊熊燃烧，形成一条火龙。妙西第二次被日寇烧光。

日军侵占暗无天日的年代！从妙西看全中国：有多少人民被残害，有多少家庭被摧残，有多少房屋建筑被焚烧摧毁，有多少城镇乡村被破坏！

青年，成为一个革命军人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有个从南京到妙西来打铁的铁匠师父名叫“齐青”，但我们只叫他铁匠师傅。他常到我家来玩，跟我讲故事。记得他一次对我说：天上有北极星（土话叫北斗星），它在北方，夜间它给行路人和航行海上的船只指明方向。在天气晴朗的夜里把北极星指给我看。他还告诉我：北方有“朱毛”领导群众打日本鬼子，抗日战争只有他们领导才能胜利。他常说：南京附近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这个军队好，纪律严，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白天帮老百姓种田锄草，夜里打日本鬼子。……他讲的这些常常使得我听得出神：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军队！

那年冬天，铁匠师傅回家去过，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从此没见到他，他讲的话却始终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难忘。

后来还有个青年借住我家，经常帮助我家干活，又和气，又勤快，我们一家人都喜欢他。住了半个月，那时国民党的一个姓黎的乡长有公干到妙西常到我家吃饭。这个青年请求我父亲替他在黎乡长面前说说情，给他谋个职业。父亲真的跟黎乡长说了，哪知黎乡长一听就回绝说：“你有钱给他一点盘缠赶快走，走得了就好……。”父亲立即通知那人快走。谁知他离开妙西几十里地就被国民党抓住就地枪决了。

1964年冬，我在舟山海军服役，中央水产部有个陈处长来看望我。他是长兴梅溪——晓墅一带人，比我大十多岁。原来他也在苏北战斗过，跟我谈了一些过去的战斗情况，又问我一些关于妙西的情况。他说他年轻时在妙西小学教过书，抗战时期妙西就有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因此，我又回想起那“铁匠师傅”和那个被杀害的青年人，也许他们都是共产党人。

1945年1月，新四军十六旅特务营进驻我家乡妙西。也许是受了南京来的铁匠师傅的影响，我和另外六个妙西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另外六人有三人牺牲，三人受伤），我被分配在一连六班，六班的班长名叫余华高，本来是做裁缝师傅的。当天下午，全营七八百人就浩浩荡荡向北开拔，离开湖州，一路向安吉、孝丰进军，部队的行进中，既经过日伪区，也经过蒋管区，遇到日本鬼子要打，遇到国民党军队也要打。

一天，在行军中与国民党军队遭遇。我们营快速展开作战，机枪一响，冲锋号一吹，勇士一冲刺，就把这股国军给冲垮了，当场俘虏了25个人，我们六班给补充了两个俘虏兵。这两个俘虏兵分配到我班后，一个表现得很开心，有说有笑，另一个原是机枪手，他一点不了解新四军优待俘虏政策，当他被缴枪时吓得浑身发抖，牙齿也捉对打架，不吃不喝，怎么教育他也听不进。当天下午三时，在公路上又遇到了敌人，敌人占领了公路西面山坡，我们占领了东面山坡。敌人的地形比较有利，班长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看住这个当过机枪手的俘虏兵。战斗一打响，我们因地形不利，边打边退，退到

了山腰里，敌人一枪打中了这个俘虏兵的背部，当场倒在一个坑里。我赶快报告班长，班长说：别管他，我们快走。这一天，连续三次战斗，我军只牺牲了一个人。这一天的战斗是胜利的。我们向西南走，直到晚上六时才进入一个村子宿营吃饭。以后到孝丰休整二十天。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剿共。不但经常袭击我们军队，残杀我们被俘的官兵，而对于支援我们的人不是杀害，就是拘捕，施以严刑苦役。日伪军更不用说了，他们不怕国军，就怕新四军，也最恨新四军。我们一离开妙西，日伪军就进妙西挨家挨户搜查参加新四军人员家属。他们把寄住我家的医生陈同洲的妻子王氏当成了我的妻子抓起来审问，幸亏伪军中有人认得她不是我妻子，才把她放了。我母亲则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关押在离妙西十五里的陈村，关了十天。我父亲被国民党吴兴县大队长李莫作抓去，被翻背绑在盛岙里的一株苦楝树上准备到晚上用锄头劈死，幸亏黎乡长跟父亲往来很熟悉，他对李莫作说：“施少臣（父亲）儿子怎么会去当新四军？他是被新四军抓去的。”这才由他保释回家。父亲差一点就没命。

新四军进驻在临安亭子、富阳三口一带天天训练，准备攻打新登城。驻扎在新登城里的日伪军闻讯后害怕起来，赶快逃避到杭州。新登城很快被国军 79 师占领。

五月间，我们特务营组建了 240 人的一个加强连到新登城附近去搞粮食，实际上是去侦察，为进攻新登城作准备。我们走出三口，走了一个多小时，发现敌 79 师前哨排在一座小山上，我们连在左面山坡展开，向山腰前进。谁知这时 79 师的前哨排却撤离小山，隐蔽到山下。不到十分钟，在十里山岙的三面山岗上出现了很多敌人，轻重机枪、82 迫击炮，对准我们山腰一齐射击。我们所在的山腰上只有一些短柴草，无法隐蔽。那天下过一阵小雨，当时虽然雨过天晴，柴草都是湿漉漉的，把我们下半身都湿透了。有几个同志裤子没有裤带扣，裤子一打湿，黏住大腿，一走路，裤子就往下掉，